

“文本”与“读者”：进入“五四”的有效路径——以《新青年》为视点



韩启云*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又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标志着自 19 世纪中叶起开始的向西方学习之路，开始由器物和制度层面楔入到文化心理层面，是近代中国震古烁今的历史转折点。这场运动全面触及了当时社会结构，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视为中国社会进入现代的起点。得益于其界标性的历史地位，五四运动研究从来都是史学研究论域的宠儿。既往关于五四运动的言说与研究已然形成复杂的知识图景，让历史鲜活有趣、可感可知成为五四运动史研究亟需直面的议题。重返五四历史现场，摆脱结果导向，再现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多元性，为现有研究注入了活力。《新青年》杂志以其特有的即时性、真实性，实录了五四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社会转型，其文本与读者可作为重返历史现场的凭借。作为新文化运动舆论酝酿、演变的事发现场，《新青年》“通信”栏得天独厚的带有历史现场感，是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可资借用的重要窗口。“文本”与“读者”不失为辅助我们回到“五四”历史现场的良好途径。

关键词：重返历史现场；《新青年》文本；《新青年》读者；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DOI: [10.57237/j.chll.2022.01.007](https://doi.org/10.57237/j.chll.2022.01.007)

"Texts" and "Readers": An Effective Path in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Youth"

Qiyun Han*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previous discourses and researche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have formed a complex knowledge picture, making history lively, interesting and perceptible to be an urgent topic to be faced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Returning to the historical scen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getting rid of the result orientation, reappearing the richness,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history, injecting vitality into existing research. With its unique immediacy and authenticity, "New Youth" has recorded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politics, economy, ideology, and culture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and its texts and readers can be used as a means of returning to the historical scene. As the scene of the brewing and evolution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Communications" column of "New Youth" is uniquely endowed with a sense of historical presence, and is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touching history and entering "May Fourth". "Text" and "reader" are good materials to help us return to the

*通信作者：韩启云, han@njnu.edu.cn

historical scene.

Keywords: Returning to the Historical Scene; The Text of "New Youth"; The Readers of "New Youth"; Touches of History and an Entry into 'May Fourth' China

1 引言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五四运动是一个震古烁今的历史转折点。“以‘五四’作为新的坐标点，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政治等，都要因它们与‘五四’的新关系而经过一些微妙的变化”[1]，五四运动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解现代中国“过去、现在、未来”的首要关键。作为“想象或辩证中国现代性的标竿”，在现代化仍属进行时的纵贯线上，无论是沿波讨源的需要，还是不施粉黛的晾晒，或是淡妆浓抹的描摹，五四运动成为了一个不断重临的起点，总在不断被回想，不断被反思。正如陈平原所言，“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五四课题常有重临的需要和必要。五四及今，一百年过去了，“五四”话题在五四事件基础上持续不断的再生产，“每代新人都因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抱负，为‘五四’启蒙运动创造了不同的意象，这种把历史作成批判现实的镜子的过程，被称之为‘寓言化’(allegorization)”。[2]随着“寓言化”层累地积聚下，关于五四运动的言说与研究已然形成复杂的知识图景。谈及五四运动，常使人“观其澜而不能索其源，振其叶而无法寻其根”之惑。尽管围绕着五四及其周边的历史叙述及专题研究，堪称汗牛充栋、车载斗量，“五四”鲜活的一面却愈发隐没，既往关于五四运动的分析框架与解释范畴，已无法让人们有效地理解历史、感知历史。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转变研究困局，让历史鲜活有趣、可感可知，成为五四运动史研究亟需直面的议题。

2 重返历史现场：五四运动研究转向

清末社会广泛存在的白话报、阅报社、宣讲、言说、戏曲等“开民智”的主要载体形式，为社会下层启蒙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社会启蒙运动虽未能短期内取得“丰硕可观的成果”，但“这个运动并非及身而止，在十年内就倏然消亡；而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走向民众’运动的起点和第一波”。[3]清末民初文学

革新运动的倡导者，虽然并未旗帜鲜明的打出“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口号，但有意提倡白话文的思想与实践，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发展开拓了基础。步入21世纪以来，五四运动研究更加注重“细节”、“具象”面向的探索。“倘若希望‘五四’活在一代代年轻人的记忆中，单靠准确无误的意义阐发显然不够，还必须有真实可感的具体印象”，如何让历史叙述真正接近历史那已经永远难以真正再现的“现场”。

在五四鲜活有趣面向的刻画方面，陈平原做的工作，惹人注目。为了亲身体验当年五四运动的现场感，陈平原老师增带领学生重走“五四”路，“沿着当年北大学生的游行路线，用将近五个小时的时间，从沙滩红楼一直走到因被学生‘火烧’而名扬天下的赵家楼。一路上走走停停，指指点点，不时以历史照片比照或补充当下景象，让思绪回到八十年前那个激动人心的春夏之交。此举说不上有何深刻寓意，只希望及此次触摸那段已经永远消逝的历史”[4]，这样的田野实践，让往昔与今日时空交错，使历史记忆触手可及。陈平原提出“回到现场”去“触摸历史”，“所谓的‘触摸历史’，不外是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收录在氏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五月四日那一天——关于“五四”运动的另类叙述》一文，文章“希望拾缺补遗，关注‘瞬间’‘私人’‘感性’，希望从具体而微的角度，展现那不大为人关注的另一种‘五四’风貌”，通过对细节的钩沉与重新梳理，再现了1919年5月4日那一天的实况。作者在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凸显人的主体性、观念心态的远焦近距描摹等方面极富洞见，规避长久以来对“五四”应然层面的意义阐释研究，从“五月四日那一天”实然发生层面出发，勾联“心绪”“天气”“情绪”“时间”等诸因素，“触摸”纷纭复杂的事发现场，独辟蹊径进入历史，呈现了纷繁复杂的“五四”图景，剑指五四真实层面解读。[5]

作者从历史细节重构历史鲜活的一面，“在以往‘进入五四’的研究中多聚焦在政治、思想视域，对历史本身的喜怒哀乐的细节或多或少有所忽略，作者借用

文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天气、人文、情绪等的还原、推理与想象，拨开‘历史’迷雾，再现‘五四运动’真实性、曲折性、生动性、复杂性及偶然性，生动而逼真的还原了五月四日那一天的街头学生运动，具有以往历史叙述、阐释所没有的生命力与活力”[6]，显然陈氏的这一重构洞见极深，重建历史现场，使历史的触摸真切而具体，再现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多元性，为政治史与社会史相打通做了一个较好的范例，令人耳目一新。

“重返历史现场”，不仅包括“五月四日那一天”有形的场，也应关注到无形的“场”的存在，如布尔迪厄所谓的“文学场”，诸如政治、思想、文化等无形场域。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同样是旨在“重返五四现场”的力作，显示了近距离观察对五四运动研究产生的积极效应。作者以亲临历史现场为归，将军阀政客、警察、师生、报人等众声喧哗的场面以史实的呈现，再现历史场景，饱满鲜活的历史细节时人可以感受、听闻、看见。透过异声纷呈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现场透视历史与社会，立体呈现五四运动的全景。[7]这些夹叙夹议、以小见大的历史钩沉暗含着对粗线条历史研究的反思，也预示着这一研究领域潜在的转变，即关注宏大历史向微观的“具体史”的转型，这样的观察，不乏新颖的眼光、独到的见解。

历史现场是历史的重要把握尺度，将学术视野引向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的现场去寻找答案，这对我们溯源历史真实启发意义极大。回归历史重新出发，摆脱结果导向，厘清事实，再谈认识，亦为五四运动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3 从阅读关照五四：《新青年》及其读者

庞大的读者群体及阅读接受的环境已成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的社会条件。

阅读是一种社会现象。正如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对阅读史的概括，围绕着这一现象，可以了解到“是谁”、“读什么”、“在哪里”、“什么时候”的历史细节，可进一步追索，“为什么”及“如何做到”等问题。从阅读关照五四，可再现许多历史细节。透过纸面上时代青年的“所思所感所想”，可以管窥时代的点点滴滴，社会的零零碎碎，思想的跌跌撞撞，呈现一份独有的1910年代的历史现场感。

一代名刊《新青年》素有“天下第一刊”的美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元典。《中国新文学大系》前言部分，赵家璧对《新青年》给出过这样的历史评价：“我国的新文学运动，自从民国六年在北京的《新青年》上由胡适陈独秀等发动后，至今已经二十年。这二十年时间，比起我国过去四千年的文化过程来，当然短促值不得一提，可是他对于未来中国文化史上的使命，正像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是一切新的开始，它所结的果实，也许及不上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般的丰盛美满，可是这一群先驱者们开辟荒芜的精神，至今还可以当作我们年轻人的模范，而他们所产生的一点珍贵的作品，更是新文化史上的至宝”[8]。《新青年》的大众阅读意义，不容小觑。

《新青年》杂志素有“时代号角”、“启蒙火炬”、“新文化元典”、“金字招牌”的美誉，笔录了五四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社会转型，是重返五四现场的尚佳视点。《新青年》文本为重返历史现场铺垫了坚实路基。长久以来，依据《新青年》留存文本解读历史，已成为在五四运动研究的范式之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毕竟有一个“庐山”存在，而“《新青年》文本”就是存在着的“庐山”，一切抛开“庐山”的阐释，都不利于历史求真的探源。从这一层面来看，《新青年》文本从没有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失其意义。

王汎森在《思潮与社会条件——新文化运动中的两个例子》一文中曾经指出新文化运动培养了一干“阅读大众”(reading public)，这一“阅读大众”对五四运动参与、旁观与见证的事发现场，便是历史第一现场。[9]《新青年》是一本以“新青年”为预期受众的杂志。

《新青年》(《青年杂志》)创刊之初，便开宗明义“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将青年全体定位为受众群。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是“《新青年》读者”之一，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就常读该“文学复兴”刊物，并且十分敬仰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后来取代了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为毛泽东学习的新榜样。[10]“《新青年》读者”泛指一切读过《新青年》的人，时间尺度甚至可以拉长到今天，包括吾辈。若对读者做出具体限定，特指1910年代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读者，时间意义上《新青年》的第一代读者，尤其是指日记、回忆录里提及对《新青年》阅读的部分读者。

法国学者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在其《日常生活实践》(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中

指出“The text has a meaning only through its readers: it changes along with them; it is ordered in accord with codes of perception that it does not control. It becomes a text only in its relation to the exteriority of the reader”[11]，文本之所以成为文本，只有通过读者才能显现出其意义。《新青年》对五四时代的社会和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阅读实现的。《新青年》稳坐1910年代甚至整个20世纪影响力、知名度的第一把交椅，文本之外“《新青年》读者”群体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接受史视阈下的《新青年》，可谓“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新青年》6卷3号“通信”栏登载了以“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为落笔的读者（据考该信稿出自恽代英），来信感慨道“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详读“通信”栏，诸如毕云程（2卷1号）、程师葛（2卷1号）、褚葆衡（2卷5号）、孙斌（2卷5号）、胡晋接（3卷3号）、淮山逸民（3卷1号）、刘竞夫（3卷3号）、姚寄人（5卷5号）、叶挺（6卷3号）等读者都有类似感受的言论表达，这些名副其实的《新青年》第一代读者，在各类议题上观点尽管相歧异甚至相背，但在《新青年》读后感上却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除此之外，杨振声回忆道“象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了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确实感到自己是那时代的新青年了”[12]。“吾辈青年，坐沉沉黑狱中，一纸天良，不绝如缕缕，亟待足下明灯指迷津者，当大有人在”[13]，这并非个例，像如杨晦、冰心、许钦文、罗仲言、张国焘、叶挺等五四青年，都在其日记、回忆性文字中不约而同的谈到《新青年》的正向引导作用。无论是当时读者实感还是后来读者回忆，共鸣同感有高度的一致性。在读者眼中，《新青年》是“黑暗中的曙光”、“涌动的春雷”，考量《新青年》对时人作用和影响的效度，信息量最即时、真实、丰富的莫过于“《新青年》读者”群体。同时“《新青年》读者”对《新青年》的许多阅读与接受，散见于其日后的笔墨文章，可作参证或补证。

《新青年》“时代名刊”的荣耀光环得益于一代又一代的“《新青年》读者”，两者密不可分。是故，“《新青年》”读者的现场观感及日后回忆仍是今人回观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可资借用的研究路径。

4 作为历史现场的《新青年》“通信”栏

白话文运动之所以“运动”起来，大众传播媒介的兴盛与拥有阅读能力的群体，两因素缺一不可。这两个因素决定了白话文阅读的深度和广度，更规界了后人回溯五四的广度和宽度。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的“思想熔炉”，是“当时思想界的变迁”[14]的真实写照。五四运动发生后的第一个年头，《新青年》旋即结集再版，刊在《新青年》7卷1号的再版前五卷合订本的广告倡言：“这《新青年》仿佛可以算得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了”，并且指出不仅涵盖了《新青年》社员的思想变迁，对社会人士的思想变迁亦有所表征。考察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这五年的“变迁”，信息量最丰富的莫过于“通信”栏。但因杂志不可离散的媒体传播色彩，“五彩缤纷”的真实性历来备受争议，编辑剪裁传播技巧的存在及其程度大小成为后来者审慎考量的焦点所在。

首先，周策纵在其极具影响力的五四运动研究中，肯定了“通信”栏的可信度，指出它发挥了“公众论坛”的功用，这个栏目讨论和发展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和思想。随着《新青年》同仁杂志性质的转变，“通信”栏的社会成效亦有转变。4卷以后，《新青年》采用编辑集议制，体现在这一栏目，则常有来信与复信同发，一信多复，集中刊发等情况，适时的会有跋或按语作组稿案头，使得诸多讨论更加深入、系统。

在栏目性质方面，许多研究者对“通信”栏编辑技巧使用与否、使用程度持审慎态度。《新青年》杂志立意“质析疑难，发抒意见”的初衷，“通信”栏负有“公众论坛”之责。但栏目自始至终都是编辑主导，“读者”原声微乎其微，究其根本，该栏目其“第一作者”在某种程度上仍属《新青年》。另外真假难辨的读者来信确难考辨。“通信”栏是否存有、又多大比例编辑篡改来信甚至“假冒”读者的信稿，没任何人能完全否定这些现象的存在，毕竟读者群中日后行迹身份可考的并不多，如舒新城、叶挺、王统照、常乃惠、毕云程等，而更多的是普通平凡的“新青年”。如此一来，就从“《新青年》读者”身份角度根源上再次降低了“通信”栏可信度，加之“双簧信”事件铁证，“通信”栏里的真真假假实难裁定。不可否认是作为一纸现代传媒，“传播+账簿”的生意经，

不可避免地会从“舆论炒作”切入，在这一点上，《新青年》绝不例外。

但从新文化当事人身上、前后多次致信的读者反应及文本内容来看，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将有“表演”成分的“可以营造的‘众声喧哗’局面”盖棺伪造。反观“通信”文本，5卷5号鲁迅来信谈到“新青年里的通信，现在颇觉发达。读者也都喜看。但据我个人意见，以为还可酌减：只须将诚恳切实的讨论，按期登载；其他不负责任的随口批评，没有常识的问难，至多只要答他一回。此后便不必多说，省出纸墨，移作别用。例如见鬼，求仙，打脸之类，明明白白全是毫无常识的事情，新青年却还和他们反复辩论，对他们说‘二五得十’的道理，这功夫岂不可惜，这事业岂不可怜”[15]。这篇来自新文化当事人的通信，再现了当时通信实况从侧面肯定了“通信”栏存在事实及发挥的作用。从文本衔接度来看，内容衔接可续的编读往来信件大有存在，陈独秀与毕云程之间多达九封之多。从内容方面看，“作为史料来看，‘通信’的重要可能不在于它谈了什么，而在于它是怎么谈的；不在于这些讨论的结果如何，而在于讨论的脉络，从通信交流中展开的一个个发生、发展、变化、深化，或者偏离、淡出的过程”[16]，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通信”栏延伸了运动的“过程”的讨论。

《新青年》“通信”栏是五四时期“质析疑难发舒意见”的重要舆论空间。翻检“通信”栏所载读者来信，从来信读者当时的反馈看，读者阅读观感具有一定参考性；从衔接可考的编读往来信件的内容来看，并没有编辑篡改主题的讨论。参照五四亲历者的事后反应，鲜有读者抱怨登载稿件被篡改伪造，《新青年》同人的“五四运动回忆”中，亦无人提及“通信”栏目的策划设计之事。因此，在没有足够信据的情况下，“通信”栏刻意营造编辑的成分不宜过度揣测。作为《新青年》舆论酝酿、演变的事发现场，“通信”栏得天独厚具的有一份历史现场感，史料意义上可视作今人进入五四的凭借。

5 结论

从近年五四运动史研究对“具象”层面表现出的兴趣来看，“文本”与“读者”不失为辅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的良好素材。五四发轫业已百年，一个世纪的时间长度，真实可感的具体印象随着斗转时移，不可避免地渐趋遗忘，而围绕着这一节点的意义阐发确不断层累

叠复。关于五四运动的言说与研究已然形成了复杂的知识图景，而围绕着五四运动本身尚有许多盖棺难定论的争议，在五四运动基本史实层面，还有进一步重返的需要和必要。“思想史与和社会史”则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通过视角的转换和材料的挖掘，或可从过去宏大历史叙事的窠臼跳脱出来，透过历史细节的吉光片羽来窥视历史全景。因是，尽可能从原初历史出发，摆脱结果导向，探寻历史的本真，成为破题的关键。五四运动前后新闻报刊业发展势好，学生报刊格外活跃，借助“文本”与“读者”重返历史现场，有助于透过历史细节厘清史实，深化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追索并烛照一系列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的相关问题。

参考文献

- [1] 王汎森.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77.
- [2] [美]舒衡哲. 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M]. 刘京建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 287.
- [3] 李孝悌.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 1901-1911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240-242.
- [4] 夏晓红, 陈平原: 触摸历史: 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M]. 广州:广州出版社, 2009: 351.
- [5] 陈平原: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10-58.
- [6] 韩启云, 李先明.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洞见”与“不见” [J]. 阴山学刊, 2018, 31 (03): 43-46.
- [7] 叶曙明: 1919, 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 重返五四现场 [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8.
- [8] 郑振铎: 中国新文学大系 (文学争论集) [M]. 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5: 4.
- [9] 王汎森: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273.
- [10] [美]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 [M]. 李方淮等, 译,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110.
- [11]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170.
- [12] 杨振声. 回忆五四 [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五四运动回忆录(上).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260.

- [13] 叶挺. 致记者 [J]. 新青年, 1917, 2 (6): 1-8.
- [14] 郭湛波: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71.
- [15] 鲁迅: 《渡河与引路》, 《新青年》5 卷 5 号, 1918 年 11 月 15 日.
- [16] 李宪瑜.“公众论坛”与“自己的园地”《新青年》杂志“通信”栏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2, 03: 32-44.